

故事趣味与人性之谜

——谈《天堂客人》影视改编的可能性

□俞春放

王霄夫《天堂客人》的问世,使得“血脉三部曲”终于整体呈现在读者面前。从《上海公子》到《六尺之孤》,再到《天堂客人》,“血脉三部曲”将故事背景集中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杭州为中心的地域范围,在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中书写暗流涌动的众生相,同时也创造了三个个性、境遇迥异而又似有所关联的人物形象。

作为三部曲的终章之作,《天堂客人》巧妙融合了意识流、生活流叙事以及精神分析等元素,打破了传统叙事的界限,为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体验。徐洲亦在评论中指出,这部小说是对读者的一场愉快的“冒犯”,这种冒犯首先“是指对读者阅读经验的颠覆与挑战,进而将读者逼出某种阅读舒适区”。而当我们进一步进入故事内核,去考察作者的创作动机和隐秘想法时,会发现一场更有趣味的冒险。

故事之趣

罗伯特·麦基在他的电影编剧经典之作《故事》一书中,开宗明义阐释了故事的重要性。在第一部分“作家和故事艺术”里,他提出了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提出的那个古老问题,即一个人应该如何度过他的一生,指出人类一直在基于哲学、科学、宗教、艺术等学问来寻找答案,但无论从任何角度,都无法回答这一问题,或许故事可以加以解答。同时他借修辞学家肯尼斯·伯克和剧作家让·阿努伊的话,说出“故事是人生必需的设备”“小说赋予人生以形式”这些一语中的的观点。

影视作品的核心就是“故事”。作品要展示的是什么样的人?需要什么?他们为什么需要它?怎样去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面临的阻力和辅助是什么?后果如何?这些因素串起了故事,讲一个好故事和把一个坏故事讲好,就是一个讲述者所面临的问题。这就涉及故事趣味的问题,一个有趣的故事足以使一部影视作品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故事趣味主要体现在故事内容的话题性上。话题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的来源于热门的现实问题,有的来源于对人与世界的关注,也有的可能来自故事本身所提供的奇观性。在我看来,《天堂客人》的话题性主要体现在呈现了历史转折点上的选择。对于包括小说、影视剧在内的叙事作品而言,将故事框架放置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是一个恰当的选择,因为人物将面临时风云带来的冲突,个人内在的复杂性更是平时所不能见。这些冲突既是使叙事得以推进的内在动力,也是读者和观众的兴趣所在。

在《天堂客人》中,这首先外化为一个谍战故事。不算人物历史所涉及的时间点,小说将一个庞大的叙事构架纳入到10年时间里,从容不迫地叙述历史大背景下的生死博弈。这个谍战故事始终疑影重重,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情报送出去了,杭州迎来了解放。至于具体是什么情报、怎么送出去的、哪些人是地下党员、主人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等等,在小说中均无明示。有意思的是,这不仅没有使小说叙事变得混乱,反而因其“暧昧”,更为吸引读者的视线,使他们从一开始就急于去弄清楚这些问题。在关注怎样把情报送出去这个所有同类叙事作品都会处理的动作线之外,更把关注重点放在事件背后的“是谁”和“是什么”上,更为关注事件背后的复杂因素及人性之谜,为阅读与观看增添更多话题性。而与谍战故事的隐秘相关联的,是爱情故事与职场故事同步登场,成为前景故事。乱世的爱情本身就充满话题性,而与谍战故事相叠加后,自然又多出一

份令人牵挂的情愫:儿女情长会不会影响人物的抉择。也正因此,对于谭杭丽这个“反派”,我始终抱有好奇,将她看作跟其他女性一样指引主人公伏申成长的“永恒女性”,对于她意外落入钱塘江被潮水卷走总是心有不甘。职场故事的趣味则在于那些小机灵、小嫉妒、小动作,谍战故事并置在一起后形成反差,让人在忍俊不禁的同时,也急于一探作者在营造这种反差背后对历史的思考。

这三层故事放在一起后,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效应。它们不是三层故事的简单相加,谍战因爱情的加入而更加扑朔迷离,爱情因谍战的存在而更富质感。在这两者背景下的职场故事则显得尤其可笑,让人不由得对历史做更多的沉思。

叙述之味

叙述本质上是场游戏,因其对时间的变形,使得原本依次展开的事件变得曲折有致。《天堂客人》在叙述上的趣味,主要体现在作者把长达十年之久的故事时间凝聚在很短的时间段内,悬念引而不发,充满张力。这种从临近情节高潮处入手的叙述手法,因其密集的信息量而把冲突推到极致,具有极强的戏剧性,可以说是影视创作中屡试不爽的不二法门。

我们可以从其对空间的处理来一探究竟。相较于影视作品对空间的展示,小说通常更倾向于作为时间的艺术,通过时间延展来推动情节发展,空间在其中的作用就是为具体的一个情节节点提供场景支持。但《天堂客人》对时空关系进行了置换,不再以时间来带空间,而是以空间来带时间。空间被放大为叙述主体,时间在空间的呈现中得以延展。在一个特定的空间中,不仅各色人物纷纷登场,而且将时间进行纵向延展,将不同时空下发生的前情往事并置在同一叙述空间下,这必然使得故事带上更多的言外之意。所以,从主人公伏申一出场开始,小说便建起了影视叙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动作,即构建起全剧的核心悬念。伏申到底是谁人?他真的仅仅是因为对沈甲妃的朦胧爱意而南下杭州,还是另有目的的我党地下党员?他是真有梦游症,还是别有用心神秘托辞?不管怎样,他看起来就是那个为了爱情独自来杭州的单纯少年,始终给人迷影重重的感觉,更像是一个局外人,一个浑然不知情的经历者,一个串联读者阅读体验的视点人物。但越是如此,越让人觉得他的故事没有那么简单。事实上小说中不乏暗示,比如几个女性间的神秘关联,伏申的梦和瞿玉郎的梦所关涉的身份之谜,伏申“梦游”中的种种奇遇,等等,均暗示着在表面的故事之下,还有更精彩的内容。小说不断在制造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又制造了一个接一个的悬念,将读者的兴趣高高提起。而最大的不确定性则体现在情境设置上,叙事对时间的变形在这里被用得酣畅淋漓,相隔十年的两个时间点常常无缝穿梭,因为并置而使叙述充满趣味,拉满戏剧张力。这个真真假假的世界,表面上风平浪静,背地里却风起云涌。

当然,真正的趣味来自独创性,好小说如此,好的影视作品更是如此。要在大量类型化的创作中脱颖而出,令人眼前一亮,必然有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人人与人之间有太多相似甚至相同的东西,但观点、趣味、情感往往是个人化的。怎样在个人化叙事与普遍性叙事之间找到沟通的桥梁,是一部好的作品必须去达成的。对一部具体作品来讲,最直接的就是体现在处理作品命题上,即如何通过人物、冲突及结局安排来呈现自己的价值观与

情感倾向。在《天堂客人》中,我们可以突出体会到作者独特的叙述方式,及其所呈现的历史观。

《天堂客人》将历史观的呈现放置于一个立体坐标系当中,这个坐标系由三条轴线组成,一是作为故事背景的历史事件,二是作为情节载体的生活场景,三是历史细节。

《天堂客人》同《上海公子》《六尺之孤》一样,虽然故事所涉时间跨度均有10年以上,但核心内容都聚焦于1945年至1949年这段时期。仅有一个宏观视角是不足以一探历史究竟的,这时作为情节载体的生活场景就具有了重要意义。与其他谍战题材作品着眼于正面表现谍战故事不同,《天堂客人》将谍战故事隐藏到幕后,隐藏在职场故事之下,而这个职场故事呈现了生活极为真实的一面。因此,生活场景不仅是作为情节的载体,事实上成为了内容本身:在历史摧枯拉朽的大背景下,一份神秘情报关乎局中人的生死存亡,但是在省党部,这最终成为一场“抓共党”的闹剧。省党部费尽心机想要挖出内部的共产党员,却演变成相互倾轧与内耗。谭杭丽愈尽忠尽责就愈显悲情,这个美丽多情的反派始终令人同情,她本可以与伏申一同成长,却在历史的错位中成为悲剧人物。至于另一条轴线,即那些相关情节里出现的真实人名与地点,最终使得上述两条轴线有了极具质感的肌理,将关于历史真相的探究与思考落到实处。徐洲亦将其概括为“天道有变”的历史观,我认为是有道理的。

人性之谜

我们知道,在影视剧创作中,人物塑造和故事结构是相互依存的,故事的事件结构来自人物在压力所做出的选择和行动,人物则通过这些选择和行动来揭示和改变。故事的最终事件既是作者的终极任务,也是人物的最终抉择,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观众的情感和理智。可以说,人物并不仅仅停留于情节之中,而是与社会和人性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在影视作品中,人物往往是故事的核心,具有多维的复杂性,人物性格的变化和发展,使得人物作为艺术品,在故事的怀抱中得到永生。

《天堂客人》主题深邃,涉及个体命运与社会历史的交织,以及在动荡时代背景下的人性探索。小说通过伏申的视角,展现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与个体心灵的觉醒。故事不仅仅是对历史的再现,更是对人性深层次的挖掘和思考。其他人物形象也丰满而复杂,这种对人性多面性的描绘,使得小说具有了出色的艺术魅力和思想深度。

当我们谈论某个影视作品讲的是什么时,我们实际上谈的是剧本中的动作和人物。具体的人物以及这个人物的所做(动作),将成为作品被影视化的基础。因此,当我们创作影视作品时,实际上就是要明白人物需求,并将人物实现需求的过程建构为核心情节。从这个角度来讲,人物即动作,而动作又可细化为外部有形的动作和内在情绪。换句话说,当从人物创造的角度来谈论一部影视作品时,我们是在谈论这个人物在做什么,以及他内在的心理基础。

作为《天堂客人》的核心人物,伏申的心理演变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展开。他以懵懂少年的形象出场,经历了一刻与神秘女子在监狱相拥取暖的神奇体验,这一刻可以说激发了后续所有剧情,从影视创作的角度来讲,可以理解为是作为剧情起点的诱发性事件。我们看到,在小说中,这个正经历着少年烦恼的北平青年,心中因此埋下情感的种



《天堂客人》,王霄夫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5月

子,这使得他不得不从北平远赴江南,而且在杭州一待十年之久。期待与那位女子的相遇成了他心理演变的起点,事实上也暗示了这个青年成长的历程及其背后惊心动魄的故事。

杭州十年生活塑造了伏申的性格和价值观,他目睹了混乱和无序,感受到了时代的无常。这种社会环境对伏申的心理产生了深刻影响,促成了一个青年的成长,这种成长当然与那个神秘女子有关,或者说,虽然我们从字里行间已经明白,伏申在南下之前早已目睹过神秘女性沈甲妃的壮烈牺牲,但她作为指引伏申成长的“永恒之女性”,却始终在伏申身边。小说为此给他创造了两个层次的人物关系,一是女性人物,包括谭杭丽、沈氏三姐妹、俏罗敷等。这组人物关系表面上跟爱情有关,实际上代表了不同的形象与命运,展现了人性的多样性,从侧面展示了伏申的成长轨迹。通常,我们可以把影视剧剧情的发展理解为由三个要素聚合构成的程式,即①通过各种事件呈现人物的初始状态——②在各种事件中呈现人物行动——③逆转、成长,作为结果的人物新状态。这一层次的人物关系实际上解决了①和③两部分内容,从①的平衡状态出发,到③的新平衡建立结束。这是一个标准的影视剧剧本的结构形态。第二个层次是书中的地下党员、特务等角色,他们的行动和选择之间产生的互动和冲突,是剧情或者行动线,是谍战叙事的真正基本盘所在,正对应着剧作程式中的②这部分。两个层次的联结点明面上是谭杭丽,她既是谍战故事中的对立面一号,也是在爱情故事中动作的主动发出者。这既为谍战故事增添了迷障,也展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平添了历史的慨叹。但背后真正总揽大局的局局者其实是沈甲妃,或者说她才是不出场的女一号,她是伏申一直在追寻的“女神”,是伏申入局的关键性人物。谭杭丽则更像是在另一端上的映射,是人生抉择中的另一面,历史巨浪中的另一种可能。

可见,《天堂客人》中每个角色都是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复杂而又真实的社会画卷。这种人物塑造和心理描写,为影视改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可能性。

空间之美

中国电影史上留下过许多以江南影像为表现对象的经典作品。《天堂客人》同样创造了一个“江南空间”,其对江南的书写,如呈现在影视作品中,势必会形成一种视觉奇观,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这里的江南包括两个方面:作为精神空间

的江南和作为社会空间的江南。在小说中呈现为历史大背景下的众生相。它作为精神空间的江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互为映照。一方面,社会空间是精神空间的现实呈现,是精神空间派生出的众生相,另一方面,对社会空间的精心结构,又丰富了作为精神空间的江南。伏申在杭州这一特定社会空间的种种奇遇中,既有惺惺相惜,又有爱而不得,更有“永恒之女性,指引我们上升”。作为动作线的谍战故事因放置于这个空间而显得别有意味,既因被爱情故事掩盖而显得扑朔迷离,又因局中人深陷爱情而使情节更富质感,从而体现出人的成长与选择。

伏申的身世之谜与身份之谜,其本质在于身份认同。伏申对伏德魁和瞿玉郎的回避一去年,相应的是受沈甲妃的感召而来的十年杭州之行。伏德魁和瞿玉郎、沈甲妃和谭杭丽,构成了奇妙的对位关系,从而使人物的成长与选择从历史叙事进入到人生之问。正因如此,以下结尾一段就很有意思:

“门开了,随着笑声,一个女子一手拿着封电报,一手提着一小壶黄酒,出现在门口。伏申兴趣不在酒上,抱起戴着鲜红色新肚兜的小角儿,往她怀里一放,告诉她,他希望继续留在杭州。女子扬了扬手巾的电报,问他,到底在等谁?此时伏申的表情很难描述,当然不过是沉默,而不是犹豫。人生不就是一种等待,只是到最后,不知道应该等待什么,等待谁。只是到最后,等待的是自己的灵魂吧。”

在此,作者无疑创造了一个作为精神空间的江南,书写了“在人生最美好的、情感生活最丰富、能量最充足的年纪,把自己点燃,希望在至暗时刻,闪现出最炽烈的如流星般的光亮”,是在最好的年龄、在特定的时代,留下可堪追忆的“勇敢站立”和“热烈奔跑”。在我看来,“血脉三部曲”书写了江南的精神史,在《天堂客人》中,这个精神史找到了一个可感觉可触摸的落脚点。这从小说每一卷的标题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小说共分四卷,分别命名为黄酒、梅雨、台风、潮信。第一个是食物,后面三个都是天文现象。这是很有江南特色的,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江南生活状态的表征,也正是这些状态淬炼了江南的精神。比如小说中反复提到的,如果有一天到杭州做客,遇上好客的主人,千万要警惕黄酒,颜色诱人,入口极好,但后劲极大,容易醉人,往往醉得云山雾罩,不省人事,就像杭州女人。再比如潮信,小说结尾有个细节,我看了其实是有点动容的,说的是谭杭丽在春天约了伏申去大桥下看潮,沈乙娘跟了过去,就看到谭杭丽被大潮卷走了。毛教官跳入汹涌的江水中救她,不幸一起消失在黄色漩涡里。但作者马上又补充说,其实一开始,是毛教官猛地一把把伏申往浪里推了一把,伏申一个踉跄,结果撞上一旁的谭杭丽,谭杭丽猝不及防,往前面一倒,直接被潮水卷走了,深藏意外的毛教官只能救她。表面上看来,这是给一个传奇故事收尾,但恰恰是类似这样的细节,读来总让人心情复杂,宁愿放弃简单的善恶判断而进入人物内心,去直面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下个人的成长与选择。

结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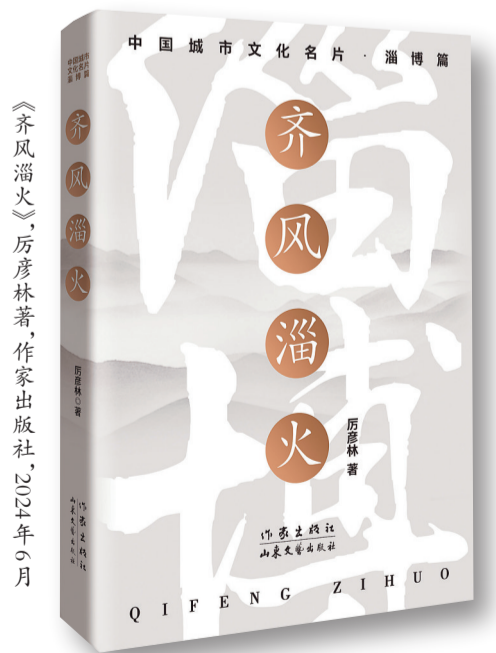
《天堂客人》作为一部兼具文学价值和历史深度的作品,其影视改编的可能性和挑战并存。从故事的趣味性到人性的复杂性,这部作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深刻的主题思考。

影视改编的成功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平衡原著的文学性和视觉媒介的表现力。通过对《天堂客人》中的人物、情节、主题以及历史背景的深入分析,改编者可以构建一个既忠实原著又具有创新性的影视作品,通过精心设计的视听元素,有效传达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故事的情感深度。相信通过精心的策划和制作,可以创作出一部既为观众喜闻乐见、又富有个性特色的优质影视作品。(作者系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院长)

千年齐文化之火的当代传承与创新

——读厉彦林新作《齐风淄火》

□宋英超 张丽军



特征。”齐国立世800余年,发生过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诞生了无数流芳百世的明君贤相。厉彦林深入历史,追述齐国古城的前世今生,以姜太公立国、管鲍之交、齐桓公“一匡天下”、齐威王“一飞冲天”的历史事件与诸子百家“稷下学宫”论辩、孔子闻韶而“三月不知肉味”的文化故事,向我们展示了齐文化开放、包容、进取、尚贤的独特气质。《齐风淄火》以齐文化为一根脉,将盛开在淄博大地的思想之花、文明之花一一勾勒在历史的画卷上,雕刻在时代的丰碑上。

探寻齐文化之火的当代传承与创新

厉彦林不仅重视对齐文化的发掘和阐述,更

强调齐文化的当代价值,着力推动以齐文化为核心的淄博文化之火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厉彦林自述,要通过《齐风淄火》的创作为“齐鲁文脉”添一把柴、续一把火。淄博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有着烧烤散发出的人间烟火,而且还有生生不息、散发巨大魅力的精神文化之火。

“古老而伟大的齐文化穿越千年,不仅为淄博这座古城留下了震撼世人的文物遗迹,更将其思想和智慧世代烙印于市民的血脉之中。”厉彦林聚焦齐文化在当下的传承,他写大商之道,强调淄博商业文化“利缘义取”的经营之道,肯定它所奠定的精神基因和血脉根脉,以及近现代以来,以淄博周村为代表,具有开放创新气质的新“商儒”。在市场化竞争的今天,今日的鲁商群体依然传承和坚守着“大商无算”“天下同利”的商儒理念,造就了淄博“天朗气清”的“美善”商业环境。

厉彦林倾心于聊斋文化,仰慕蒲松龄的文人气质和社会责任感。“蒲松龄为人、从文、做事面向普通百姓,始终关心民生疾苦,为百姓执笔,替百姓奔走呼号。这种将百姓放在心上的民本精神,在齐鲁大地上扎根开花。”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从一个北固山的少年郎,到兰考大地上的“焦桐”,从“锄把子”到“印把子”,始终不变的是他为人民服务的信仰。齐文化的熏陶、共产党人的初心

使命,共同铸就了焦裕禄这座精神信仰的不朽丰碑。从聊斋文化到焦裕禄精神,传承的是浓浓的民本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的胸怀。

放眼当下,淄博在2023年的“出圈”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千年齐文化在现代社会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在涌动的浪潮中,淄博商家守得住初心,坚持诚信为本,这是对以“义”为核心的商业文化的传承;淄博政府及时谋划、整体布局,建立“您码上说,我马上改”等即时有效的政策沟通机制,体现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继承的是齐文化中的民本精神,回答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信仰之问。千年齐文化深深扎根于淄博这片热土,在不断传承中实现创新,开放出璀璨的文化之花。

以文化为中心的城市传记体写作

城市是复杂的综合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内容。选择何种角度为城市作传,决定了作品的独特面貌,这也是《齐风淄火》的创新之处。厉彦林以齐文化为抓手,以淄博烧烤火爆现象为切入点,融合宏观与微观,深入挖掘城市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背后的深层文化原因。全书结构严谨,各章在内容上相对独立,又在创作意图上一脉相承,整部作品浑然一体。

《齐风淄火》的每个篇章都聚焦于齐文化的重要标志。全书九章分别分析淄博烧烤、陶瓷文

化、聊斋文化等齐文化具体内容,在这些具体表象背后,始终有一条文化线索贯穿其中。厉彦林以齐文化统领全篇,各章节都围绕齐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进行。从社会热点切入历史文化,又从历史中走出,一步步接近当下,整部作品在结构上像一座秩序井然的齐文化博物馆,读者在阅读时,跟随作者一步步走入历史深处,又逐渐体悟到齐文化那无可替代的现实意义。

从叙事视野来看,《齐风淄火》超越了时下非虚构文学作品的流行模式,将宏观视野与微观分析有机融合起来。作品中既有淄博烧烤、海岱楼钟书阁、周村古商城等微观齐文化案例分析,又富有历史感和现实感,在追溯齐文化根脉、探索文化发展道路和应用路径上具有广阔视野。《齐风淄火》将齐文化的整体特质、历史渊源与淄博文化发展、应用的具体案例相结合,使得整部作品兼具历史厚度、思想深度和时代高度,既回答了宏阔的文化命题,也具体且细致地将文化带回到社会现场,建构了富有诗性的叙事形态。

总之,《齐风淄火》是一部城市之书、历史之书,更是一部厚重的精神之书、文化之书。厉彦林以淄博千年齐文化为主线,不仅向读者展示了齐文化的精神内核,更聚焦齐文化在当下的传承创新,呈现了淄博模式的价值所在,为淄博描绘了一张生动画像,彰显了齐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也为新时代中国城市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文化案例。

(宋英超系暨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张丽军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

山东淄博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先秦时期作为齐国国都,酝酿出了璀璨的齐文化。在漫长岁月中,淄博大地逐渐衍生出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文化、重商的海洋文化、陶瓷琉璃工艺文化、聊斋文化和焦裕禄精神,它们共同铸就了齐文化“开放、包容、创新、重商、想象力”的文化基因。这一文化根脉横亘历史,在当下传承与转化,成为淄博发展模式的核心精神内容。齐文化的魅力缘于何处?如何实现齐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文化在城市未来发展中的作用是什么?作家厉彦林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审慎的史料考证、深入的实地调研和高瞻远瞩的视野,在《齐风淄火》中回答了这一系列历史之问和时代之问。

追溯淄博千年齐文化根脉

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发源地之一的淄博,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厉彦林运用历史的眼光描写和记录,尊重历史真实,还原历史现场。他在书中详细展示了齐文化的整体风貌和独特气质,为读者呈现了百家争鸣、开放包容、尚贤重功的“泱泱齐风”。

齐文化源远流长,在千年发展中逐渐汇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流的同时,又保持了自身的独特性。鲁迅在1934年给陈烟桥的信中指出,“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在中华文化的花园中,一种文化既要与中华文化的整体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相一致,又要保持自己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是一种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最本质的特征,越是有特色的文化,越具有影响力和感染力。

《齐风淄火》以“齐风泱泱云飞扬”一句话概括了齐文化的独特风貌,引发读者对那段气势磅礴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的无限畅想。“齐文化以广收博采、融会贯通、自由奔放、积极进取为